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四期 ——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2d)

【文献资料】	“西纠”通令全录	无 名
【往事非烟】	1966年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	侯美度
【史海钩沉】	“样板戏”的台前幕后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献资料】

“西纠”通令全录

• 无 名 •

“西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是很有名气的，它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之所以要加上“分队”，因为在首都除了西城区，还有东城区、海淀区、宣武区都相继成立了纠察队。这些由“革干、军干”子弟组成的纠察分队中，“西纠”的影响最大，这源于西城区干部子弟学校多，他们能通天。只是他们的天，从早晨八九点钟很快就转为傍晚五六点钟，整个历程只有三四个月。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是红卫兵中的红卫兵，凭着“我们不管谁管”的底气，一度有发号施令的权利，一腔热血，很以为得意。不久，斗争的“大方向”逐渐明确，他们很快就失势了。老红卫兵们在反思，明白了在这场大运动中，他们扮演的，只是执行“大乱到大治”中，打头阵的小卒子角色，于是大呼他们是运动的受害者。其实，若仔细地算一算，这场历时十年的运动中，几乎无人得益。

“西纠”发过多少“通令”，无定论。有的说有十个，有的说十三个。我只找到前十个号，以后的通令，一直找不到。可能就只出过十个，因为9月6日，“西纠”的对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已经诞生。可能也出过十三个，只是“西纠”已失

去发号施令的权威，人们没把它当事，失了踪影。

本博以前介绍过“西纠”的第三、五、六、七、八、十号通令，近日得到第四、第九号复印件。至于第一、二号通令，照第三号通令说明，已“包括在第三号通令中”，找到了原件资料，确实是这样。这次把“西纠”第一至第十号通令，一并录下，作些小说明，供有兴趣者参考。

（1966年8月25日晚，北京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率先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第二天就连发了二个通令。这二个通令内容，录自相关资料。这二个没头没脑的通令，可能并未大范围发布，没见过原件。）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一号通令

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

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此通令立即生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二号通令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切切此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三号通令：一、二条中，包括第一、二号通令内容。从这个通令条理清楚，可看出有“长胡子”的高人开始介入，指点“西纠”通令了，使通令的行政水平，大幅提高。）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三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于8月25日晚宣告正式成立，于8月26日上午开始执行任务。

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宣传品和禁令。我们要和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做最坚决的斗争。

我们现在决定：

一、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为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红卫兵的迫切需要，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的武器、粮食、方向盘！一定要大量印刷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

三、绝不允许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段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

六、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

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八、查抄地、害、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以上决定，红卫兵纠察队员一定要积极宣传，严格遵照执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带头执行。对无故违反者，要进行批评。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反革命破坏者，要进行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指挥部第一、二号通令的内容和精神全包括在第三号通令中。此通令自颁布之时起，立即生效！）

（铅印 8 开）

（第四号通令：这个通令规定“黑六类”在 9 月 10 日前，要迁出北京。）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

当前，全市广大的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进行查抄，查出了坏人，抄出了赃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种革命的行动，好得很！但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行动中存在问题，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乘机搞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密组织，严密纪律，严密行动，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真正把这一工作搞彻底，搞胜利！

为此目的，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草案）

一、要深入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在未了解清情况之前，不要草率进行搜查，以免搞错或被坏人利用。要力争做到查得准，不错查一家，也不漏查一家。不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

二、要通过组织

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一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被某单位查过的家由此单位负责到底，其他单位要过问，必须与此单位联系。

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后发制人”。

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敌人想复辟，想捣乱，都是办不到的！我们丝毫不怕他们！我们红卫兵绝不乱动手打人。我们与他们文斗，正是证明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文斗之后，情况查明，到那时，该专政的专政，该宽大的宽大，该给出路的给出路，但如果谁不老实，胆敢动武，进行阶级报复，那就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这就叫后发制人。查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抓住主动权，要力争文斗到底，不出现武斗。

四、一切缴获要归公

毛主席说：“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们查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查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支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赃物等。所查收的一切物品，都不要损坏，要全部归公，交给国家。红卫兵身上，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脏东西！各单位里，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脏东西！

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

毛主席说：“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对黑六类分子家属中主动检举、自愿要求检查自己的家、并配合协助检查者，要取欢迎态度；立功者，可以宽大。查抄的方法和程度要根据对象，有所区别，不要一律对待。查抄的物品，要有重点，要有分寸，不要影响家属的正常生活，但是查抄必须要仔细，要彻底。黑六类的家属中，多数青少年有革命的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只要他们能够彻底背叛家庭，坚决革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我们要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为着这个目的，所以要调查研究，所以要区别对待，所以要文斗。在查抄的整个过程中，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严防坏人钻空子。

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

我们查抄，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打击敌人，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沉重地打击敌人。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出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进行大张旗鼓地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通过斗争，彻底斗倒、斗臭那些吸血鬼；通过斗争，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长无产阶级的威风；通过斗争去教育、争取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烙印，使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改造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通过斗争，促使革命群众的团结，万众一心，群胆群威，英勇杀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发动更加广大的群众，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来！

七、给出路

《十六条》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规定，望红卫兵纠察队员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参照执行。望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督我们执行。

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我们要人人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遵守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如果哪个红卫兵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情节严重者，要进行处分。

我们红卫兵战士，要时时、事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坚决照办！

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复印件：16开2版）

（第五号通令：主要内容，是“严禁打人”。尽管“西纠”也打人，但他们认为“此打”非“那打”，他们不允许其他红卫兵“违反政策”的乱打。《第五号通令》对阻止由他们自己发起的“打人风”起到了一定作用。）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林彪——

为了捍卫毛主席思想，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了按照《十六条》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对于身份不明，情况不明的人；对于犯有错误，但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但性质未定的人；对于已经定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律不准打。

我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卫兵，必须坚决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十条》办事。

以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话为界，今后红卫兵中违反最高指示，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乘机行凶者，一定要严加惩办，坚决镇压！真理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手里，我们用文斗，一定能够把敌人彻底斗臭、斗垮、斗倒，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油印：16开）

（第六号通令：9月9日连发了“第六号通令”和“第七号通令”。其中，“第六号通令”针对“第五号通令”中的“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作了具体补充。这些“具体补充”，讲究政策，提高了可执行性。这同当时的“首长讲话”是吻合的。）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六号通令

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副、供、信——《二十三条》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人民日报》社论

本部九月三日颁布了第五号通令。

通令中说：“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了按照《十六条》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由于通令中说的不够具体，现在我们特作如下补充。

一、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二、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三、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四、关于逼、供、信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方法逼人口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人利用，这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以上五条，作为对第五号通令的补充规定，望红卫兵同志们参照执行，望广大革命群众监督我们执行。

纠察队员有权利根据以上规定进行工作，有权干涉和制止一切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行动。

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决不会束缚我们的手脚，限止我们的革命，相反，只能使我们的战斗力更强，使我们更善于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这是一切阶级敌人所最害怕的！

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部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上海闸北第二中学红卫兵总部抄印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油印八开）

（第七号通令：为何9月9日，刚发了“第六号通令”，又急匆匆发布“第七号通令”，因为该通令若晚发一天，会闯大祸。这个通令纠正了“第四号通令”的某些规定，如勒令“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在9月10日前，必须迁出北京，回原籍监督改造。注意！是“9月10日之前”，也就是说，9月9日都要走光。若没走，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要进行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这个通令救了一批所谓的牛鬼蛇神。）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指挥部第七号通令

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论政策》

对四清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二十三条》

本部于八月二十九日颁布了第四号通令，提出了七项规定。

现就目前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补充规定。本部以前所发的通令，如有同这个通令不一致的，一律以这个通令为准。

第一条

从农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窜到北京，或隐瞒身份，隐瞒历史，隐瞒罪恶活动而混入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确实查明后，要勒令其离开北京，回原籍，由受其迫害、了解其罪恶的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监督劳动，实行改造。

处理这类人要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处理办法，由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不放走一个隐名埋姓、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在这类人中，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

这类人的家属、子女，若不属于上述四类人，本人又不能独立生活，或本人在京有人抚养，就可以不离开北京。

这四类人离京限期由原订九月十日以前，现改为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如有特殊情况，还可以考

考虑酌情延长)。

第二条

1、关于资本家。

资本家不必离开北京，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

爱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奉公守法的资本家，一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与他们的矛盾还是要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原则。

2、关于右派分子。

已摘帽的右派分子，不再属于右派分子的范畴。但如果摘错了，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右派分子不必离开北京，继续留在原单位，由原单位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处理，更便于对这类人的斗争、监督和改造。

3、关于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

有历史问题，已彻底向组织交代，经组织上作过结论，摘掉帽子，并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权利，本人没有现行反动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接受改造。

这类人中如果有原来所作结论不合适者，可以在运动后期由组织和群众重新作结论，现在不要急于处理。

4、关于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

要把这类人与地、富、反、坏分子区别开来，区别对待。可以让他们在原单位、原街道继续工作和居住。就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接受改造。这类人中如有摘错帽子者，可以由组织和群众重新作结论，但不必急于处理。

对于以上四类人中违法乱纪，有现行反革命言行者，要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制裁。

第三条

1、要有组织手续。

对于确实查明，属于第一条所说的四类分子，要通过组织，限其按期离开北京。

办理其离京手续要以本人所在单位和派出所为主，查抄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要主动配合，并且最好与原籍所在单位事前取得联系。其户口迁移手续要有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单位直接负责。其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或个人可以间接配合，不得直接干预。这是为了防止坏人从中捣乱，从中渔利。

2、要给予生活保证。

要保证其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物品。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对他们进行武斗，要保证他们在路上的安全。

以上规定，即日起生效。

派出所、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在此以前处理的情况，如与此通令不一致的，由有关部门酌情考虑，负责处理。

我们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决不是对敌人的宽恕，相反，我们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上海市闸北二中红卫兵临时总部翻印

发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油印八开）

（通令第八号：这个通令开头的“毛主席说”，我找遍“语录”本，没有此内容，偶尔查得，是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内容。另外这通令提及了“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部分内容的口气，有些莫名其妙的“硬横”，可能同9月6日反“西纠”的“第三司令部”的成立，和9月7日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场武斗有关。这时，“西纠”的对立面已经产生，“保皇”同“造反”的斗争，正在展开。）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八号通令

毛主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红卫兵战士，正是如此！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前一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行动的大方向始终是革命的。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处理，如抄家、，驱逐四类分子，斗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处理不当的极少。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所说：“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里，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砌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们对于第六、七号通令作以下补充和修改：

(一)、我们再次说明，对于顽固不化，拒绝改造，民愤极大的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必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

(三)、所谓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包括剥削得来的财物。

(四)、资本家留在城市里，发动受其剥削压迫，最了解其罪恶活动的工人来监督改造他们。这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资本家最害怕的。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与资本家相同。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负责任地把脏水泼到别人的院子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力量、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武斗，不是体罚，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正如，我们第六号通令中所说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决不会束缚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的革命。相反只能使我们更善于革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这是一切阶级敌人所害怕的！

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这是革命势力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触及灵魂的必然结果，是由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动荡是好的，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可以预见，在群众运动的风浪中，必将涌现出无数智勇双全的革命闯将！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必将诞生一个通红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

上海市东方红中学（靖南中学）1966—9—15

（第九号、第十号这二个通令，都发布于9月14日。“西纠”以红卫兵纠察的身份，为国庆节及大串连发布通令。第二天，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西纠”在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敬献纠察队袖章，但毛主席没有接受。这对他们是一个重大打击，风向开始转了。）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九号通令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毛泽东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

一、形势

“激浪冲天春汛怒，奔雷动地早潮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东流之水，浩浩荡荡，狂奔不止，猛烈地冲击着旧世界的堤岸，把整个地球都震动了。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无不拍手称快。他们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犹如一轮红日，放出了灿烂的光芒；看到了中国毛主席的红卫兵，冲锋陷阵，大显神通；看到了革命的洪流锐不可挡，必将埋葬一切旧世界！

相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伟大的运动面前，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们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疯狂地攻击红卫兵，掀起了又一次反华大浪潮。如此这般，只能暴露他们内心的空虚，只能说明他们日暮途穷、末日快到的惨局，只能象蠢人一样“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二、任务

“十一”将到，世界各地、各界外宾将云集北京。他们能来到北京，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失败！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北京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完全有责任、有义务，用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用我们革命的造反精神，革命的纪律，去鼓舞同志，去争取力量，去痛击敌人！

三、几项规定

1. 充分利用外宾参观、访问、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的机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种带到世界各地，烧起世界革命的烈火。
2. 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对待外宾，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要站得高，看得远，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3. 每一个纠察队员和红卫兵战士，都必须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做好外宾保卫工作。
4. 不要阻拦外宾的车，不要围追外宾，除了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不阻拦外宾照相，保证他们的正常活动。对于外宾的衣着、装饰、爱好，也不要干涉。

全市的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为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而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延安一中（原49中）红色革命军翻印66—9—15

（第十号通令发布时，“西纠”已经受到了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挑战，但余威尚在。所以，这个通令，对解决北京接待蜂拥而来的各地红卫兵，是有成效的。此后，我再也没找到“西纠”发布的通令。）

◇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十号通令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

——周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学生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大串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件大好事，没有这样一个大串连，就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这样一个大串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深入发展。全国革命大串连，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高潮的标志。

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北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去外地煽风点火、学经验，这是我们北京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外地同学奔赴北京串连、学习，这更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外地的同学不怕困难，冲破层层阻挠，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他们这种为革命敢闯、敢造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京红卫兵、革命同学应该举双手拥护中央决定，用最大的革命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学。为了保证全国革命大串连的胜利，我们向全体红卫兵提出几点要求：

1、全体红卫兵立即动员起来，深入地学习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同学大会上的讲话，领会全国革命大串连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以便统一行动。外地来京的同学，多部分出身红五类家庭，他们是来干革命的，是来学习的，我们应该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阶级兄弟。对于一部分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的同学，只要他们是来干革命的，我们要热烈地欢迎，但是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有人破坏全国革命大串连。

2、全体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尽一切可能解决外地来京同学的困难，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各单位负责人应当迅速地尽可能的让出房子和市委取得联系，把外地同学的住、吃、交通、医药落实下来，尽快地满足他们的交流经验的要求。

3、全体红卫兵立刻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各单位要有人负责，成立接待组和区、市接待组联系，胜利地完成任务。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复兴门内大街5号翻印

上海革命中学（原二十？）《永远红》战斗小组转印 66.9.19（油印八开）

~~~~~

## 【往事非烟】

### 1966年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

• 侯美度 •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18岁，在上海市市东中学读高二，改名红鸥。这年11月，我参加了“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成立大会，从此卷进了上海“文革”的漩涡。反思十年浩劫，我曾做过错事，也做过好事。现将我亲历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回忆如下。

#### 一、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

1966年11月12日凌晨，张春桥乘吉普车心急火燎地赶到安亭。

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王洪文、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包炮居中，不时帮两方讲几句话，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

张春桥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又不听工人代表的汇报，对王洪文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搞些什么名堂，你们这样停止生产北上控告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按以前中央规定，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去，叫工人统统回上海，有什么事情到上海再说。”

12日上午8时，天下着大雨，张春桥披着军大衣和潘国平、王洪文乘坐大卡车来到安亭堆料场。他看到在场的两千名工人没人打伞，没人披雨衣，都站在雨中，便推掉王洪文撑在他头上的伞，王洪文明白这是不搞特殊化的意思，便把伞收起来了。

他第一句话说：“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这句话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工人们抢话筒发言，想起这几天挨冻受饿，病倒昏倒，眼泪禁不住往下掉。工人们哭完了，说完了。张春桥表态，他读了陈伯达电报原稿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他又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说完话走了。他的表态引起造反队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我们这些在场红卫兵的不满。

作为当时“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对于张春桥的训斥，根本不回一句嘴，并抱头大哭说：“我们犯错误了。”王洪文动员工人们回上海，只有一半人愿意跟他回上海，还有一半人骂他右倾，造他的反，坚决跟他分道扬镳。中午，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队员回到上海。下午4时，张春桥得知还有一千多人没有回到上海，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把这批人劝回上海。

步行北上的造反队员在谢鹏飞的带领下晚上到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宿营”。

王洪文坐着张春桥派给他的轿车，来到昆山。他刚进校门，就被“尖刀班”扣住了，“尖刀班”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像押罪犯一样把他押到谢鹏飞等头目面前。王洪文被“尖刀班”的年轻人关在一间教室里，半夜，他趁“看守”打盹之机逃了出来。

12日晚，张春桥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他表态支持上海工人造反，工人会按中央指示全部撤回上海，安亭事件便可以顺利解决。江青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把这些新情况立即向主席汇报。

13日中午，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紧急常委会，研究了“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曹荻秋打通了当时的中国第四号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电话，陶铸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即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

张春桥还与陶铸通了电话。（详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下午3时30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签字。五项要求（原文）是：

- 一、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
-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上海市委立即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市委常委会上，张春桥受到了整个上海市委的一致反对，他们责问张春桥：“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张春桥签五条，完全是先斩后奏，他不仅没有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甚至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招呼，他昨晚和江青通电话时，也不知道有这五项要求，在文化广场，他来不及与江青通电话请示就下了决心，签完五条从文化广场回到康平路，这才打电话给陈伯达，把签字的情况告诉陈伯达。晚上，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表示完全同意张的做法。一分钟后，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擅作主张。陈伯达已经站在张春桥一边，给他们讲了许多大道理。

## 二、向红卫兵求助

11月13日晚上，安亭事件并没有打上句号。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苏州市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步行到苏州，占领了几家苏州澡堂。江苏省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占领了江苏省委大院。如果北上的工人再制造苏州卧轨事件、南京卧轨事件，张春桥将逃不掉干系，因为是他承认安亭卧轨事件是革命行动。退一步说，即使这批北上工人不卧轨，老老实实步行到北京，他也照样完蛋。中央要他把全部北上的工人截回上海，他没有做到，他还直接违背了周恩来、陶铸关于“不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行动”的指示，违背了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的精神。他不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反对党中央”的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这可是掉“颗郎头”（沪语：脑袋）的罪名。他曾恐吓潘国平、王洪文：“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是够杀头了。”他们够杀头，他支持他们，他又该当何罪呢？反革命包庇罪？

教唆罪？渎职罪？如果他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他就不会因为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相反还能立功。可是苏州北上的工人根本不把张春桥看在眼里，还把他派出去的王洪文关押起来。上海市委不可能救他，他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呢？

11月14日上午。电话铃响，我在巨鹿路“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室拿起电话。

“我是张春桥，我找‘炮司’的红卫兵。”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  
“能说一说苏州、南京的情况吗？”对方用的是商量的口吻。

我如实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张春桥。

“这样吧，请你们红卫兵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张春桥说。

二十分钟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汪在银送到康平路。

张春桥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一见我们进来，立刻迎上来和我们握手。

老汪头领着我们读了几段语录后，用湖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说：“张春桥同志，请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张春桥谈起奉中央文革之命亲自到上海，一直谈到签五条，他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安亭事件，我来上海之前，他把我找去谈了话，要我把安亭事件处理好。江青同志亲自把我送上飞机。我到上海来了以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些工作，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回上海了，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继续北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我到上海是来解决安亭事件的，现在没有解决好，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我这才发现张春桥眼圈发黑，神色疲惫，嘴唇和手指被香烟染得很黄。我说：“张春桥同志，您应该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做。”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有你们红卫兵小将支持，安亭事件一定能解决好，你们说是不是？”张春桥说。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到苏州，把北上的造反队员全部劝回上海，然后到南京，把那里北上的造反队员也全部劝回上海。任务很艰巨，你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去？”

“我愿意，你呢？”我大叫起来。老汪头比我动作还快，他已经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走。我去把他们统统抓回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不要急呀，我还要给你们派两辆吉普车，给你们开两封介绍信，我在文化广场的讲话录音，你们也带上，你们吃饭问题，住宿问题请当地政府解决，你们看看，你们还需要什么？”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随时要跟您联系。”我想了想说。



“你们再想想还要什么？我现在就给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写信，写上红鸥、汪在银两位小将的大名，请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协助你们，一会你们带上这封介绍信。”张春桥边写信边说。

“红鸥呀，这事全权委托给你们红卫兵小将了，我嘛，就不准备去了，在上海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在上海等你们的好消息。”临分手时，张春桥又一次和我们握手道别。

### 三、在苏州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带着张春桥的亲笔信及录音带，回到巨鹿路。大话说出口了，兵在哪儿？厚道的孙赤峰二话没说，到交大去搬兵，老汪头打电话搬救兵，我则站在门口“钓鱼”，来一个拦一个。

不一会，孙赤峰带了八九个“反到底”红卫兵到，再加上我和老汪头网到的“鱼”，共有十五六个人。两小时后，我们乘着吉普车来到苏州。

北上的造反派队员被苏州市委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中午，我们一行人迈着解放军的步伐，排着队，呼着口号走进铁路中学。许多工人认识我，知道我是陈伯达电报也敢批的小左派，都涌上来和我们打招呼。我说：“请大家到教室里坐，我们红卫兵要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工人们分坐几个教室，我们红卫兵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几个教室进行宣传。我和老汪头刚踏进一个教室，工人们非要拉我唱歌，我只好唱了一段《造反歌》。我刚唱完，工人们鼓起掌来，还叫“再来一个”。我可不想再来一个了，我赶紧掏出红宝书：“请同志们翻到第一页，第一段。”我们读了一段又一段，工人们态度很认真很虔诚。读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张春桥同志同意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革命要求。现在我来读一下……”老汪头在教室里来回走，分发《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工人同志们，我们到北京告状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就是杀回上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讲完了，没有人为我鼓掌，工人们沉默不语，他们从大道理上讲承认我说得对，但极不愿意回上海，多少次羡慕地看着红卫兵去串连，现在找到这么个机会，哪能轻易放弃。

又上来几个红卫兵好言劝工人们回上海，张春桥的录音讲话也放过了，工人们依然沉默，不鼓掌，不表态。气氛一度僵滞。

老汪头上来讲话了，他可没有我这份耐心，他翻开硬纸板讲义夹，垂下吉普赛人的大脑袋念道——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严正声明（回忆稿）：

- 1。自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之日起，谁还要继续北上，谁就是反革命！
- 2。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处理安亭事件，谁还要继续北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教室里再也不安静了，工人们交头接耳。我很吃惊，老汪头这份声明，我一点也不晓得，他也没和我商量过，肯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为。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耿金章站起来，说：“红卫兵小将，刚才你们读的五条，那是张春桥为王洪文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

海，大家同意不同意？”工人们齐声应道“同意”。

我很没有经验，听耿金章提这个要求，就想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去打电话。我说：“好，我去把张春桥叫来，为你们签字。”我和几个红卫兵匆匆赶到苏州市委，要通了上海的电话，我告诉张春桥，工人已答应回上海，只要他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张春桥轻松地一口答应。

晚上，张春桥赶到苏州，在市委招待所与耿金章谈判，我和老汪头都在场。耿金章掏出类似五条的要求，张春桥看了看，沙沙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耿金章得意地笑笑，他收好《五条》后，向张春桥提出要魏文伯、曹荻秋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否则不回上海。他振振有词地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看样子张春桥着实吃了一惊，但他不露声色地说：“我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我立刻打电话到巨鹿路，是许云飞接的电话，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要他赶快想办法，把魏文伯、曹荻秋“揪”到苏州检讨。

许云飞接了我的电话后，把卫东（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等七八个红卫兵从被窝里拉起来，说有紧急任务。

大家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他们来到康平路市委大院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不让进。许云飞的牛劲上来了，第一个从围墙上爬进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翻墙进去。许云飞闯进一间房间，房间里铺着红地毯，陈设很气派，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给魏文伯的公函，断定这间房间主人是魏文伯，于是给魏留了一张条子，勒令魏三天内接见他，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写完条子，几个人坐在地毯上，开始静坐示威。11月15日，这几个人开始绝食，因为他们无法出去弄早饭，出康平路的门，白天要进来更困难。绝食未到中午就结束了。有人来通知许云飞等人，曹荻秋、张春桥在会议室等你们。

原来中央方面也有了变化。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共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5页）15日，王力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五项要求。”

许云飞几个先到《支部生活》编辑部饱餐一顿，然后到会议室，会议室除了曹荻秋、张春桥外，还有《解放军报》记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记者等十几人。

许云飞首先开炮：“上海出现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欺骗群众造成的，我们都希望北上的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曹荻秋自己出面，以求得群众谅解。”

张春桥点头称是，讲了一大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话。

为了缩小事态，尽快结束安亭事件，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曹荻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到苏州去与工人见面。

会后，三辆轿车直驰苏州，曹荻秋、韩哲一、一辆车，张春桥、一辆车，许云飞等人也乘一辆车。

耿金章又拿出一份《五项要求》，内容与第一份《五项要求》差不多，张春桥很快签完字，曹荻秋、韩哲一在张春桥名字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和老汪头提出工人同志要见三位领导，三位领导爽快地同意了。

11月16日一早，几辆大轿车开进铁中接工人回上海。工人要求风风光光回上海，他们提出要乘大轿车，我与苏州市委商量，苏州市委同意派大轿车。

送走“工总司”苏州大队，我们又坐上吉普车，奔下一站——南京。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耿金章，我们商量到了南京后，先个别与工人们谈心，然后再开大会。

戴祖祥是“工总司”南京大队的头领。在江苏省委招待所，我们没有找到潘国平，于是向精明瘦小的戴祖祥介绍了上海、苏州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来接工人回上海的。

戴祖祥对我们异常亲热，他说我们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在南京北上工人大会上，我们宣读了双五条（上海五条、苏州五条），工人们长时间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杀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戴祖祥说：“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回上海的，是极其光荣的。今天‘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小将带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上海的亲人来接我们回上海，我们全体北上工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江苏省委很爽气，派了专列送上海工人回上海。

暮色渐浓，我们把最后一批北上的工人送上火车，看着列车离开月台，向上海开去。

至此，张春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圆满地完成了。1968年，张春桥在上海市革会常委会上说：“在安亭事件中，有一个红卫兵救过我，她叫红鸥。”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救了他。

11月16日下午。在上海红都剧场，张春桥接见从苏州返沪的上海工人。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 《世纪》2013年01期

~~~~~  
【史海钩沉】

“样板戏”的台前幕后

• 杨银禄 •

一部戏好与不好，检验的唯一标准，是看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张东川和阿甲一起带《红灯记》剧组南下公演，在广州东风剧场和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演出时，场内观众爆满，场外人头攒动。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纷纷跑过罗湖桥一睹为快。同年3月初，剧组挥师北上，在能容纳三四千个座位的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42场，观众超过11万人次。一些买不到票的观众还给报纸写信，希望能得到一张说明书，以补向隅之憾。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文章中回忆说：“在苏州，我亲眼看见观众们边看戏边流泪，有的自己的手绢湿了，又向爱人的口袋里掏手绢，许多观众说，真没想到京剧表演现代革命斗争生活能如此成功！”

◇ 毛泽东给《沙家浜》命名，给《红灯记》改词

京剧现代戏和其他剧种的改革创新，是一项庞大浩瀚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凭几个人一时冲动，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发挥很多人的聪明才智，经过长时间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好、做成功。

毛主席平时很喜欢京剧，对京剧如何演好现代戏也非常关心，并曾与京剧界人士专门就此进行了座谈。1964年7月23日晚，毛主席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他看得非常入神，看完后又与剧团编导和演员进行了座谈。在肯定了《芦》剧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剧中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二是军民鱼水关系不够突出，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三是芦荡火种结尾不合适。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对剧组同志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戏是两截，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下去也可以，戏是好的。”在谈到戏的名称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我看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在谈到京剧的唱词时，毛主席又说“京剧要有大唱段，老是散板、慢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想不到毛主席对京剧还这么有研究，大家暗自佩服。

1964年11月6日晚，毛主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红灯记》。戏演完后，毛主席走上台和大家亲切握手。当与袁世海握手时，毛主席问：“你这个鸠山演得很成功，跟谁学的？”袁世海急忙回答：“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毛主席听后笑了，并就戏中一个小的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就是当戏演到李玉和要出门时，小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戴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成围巾。”江青当时见毛主席对这个戏十分赞赏，连忙对主席说：“这个戏是我搞的。”不久江青又来到中国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影响。”

◇ 安徽、上海争抢李炳淑，官司打到中南海

《龙江颂》拍成了电影，收镜时，江青正在广州休养。听说片子出来了，她让我打电话叫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狄福才、钱浩梁、刘庆棠赶快将片子送过来先睹为快。三人带着样片乘飞机到了广州珠江宾馆看片子，看完后江青一改往常爱挑剔的面孔，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没想到江青审片这么顺利，剧组人员大大松了一口气。而更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毛主席对《龙江颂》

的推崇。

在农村长大的毛主席对农村题材的作品尤其关注。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已拍的几部样板戏却没有一部反映农村的，主席对此颇有微词。也正因此，《龙江颂》刚刚杀青，毛主席便急忙调看了电视转播，并大为赞赏，说：“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我们国家将近六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毛主席对剧本的修改也作了指示：“黄国忠（阶级敌人）不要代表一个，要代表一派……结尾不要庆丰收收场，要开打收场……”剧组便对全剧着手进行修改，但改来改去，六易其稿都觉得不对劲，最后只好还是回到“弘扬共产主义风格”这一主题，以庆丰收收场。毛主席在电视里连看了几次，对此也没说什么，这在样板戏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对《龙江颂》情有独钟，对扮演江水英的李炳淑也是关怀备至。1972年7月30日，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李炳淑突然接到毛主席身边的护士吴旭君传话：“毛主席请你今晚去见他。你参加完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侧门等着，有车来接你。”毛主席接见？李炳淑激动不已。实际上，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与毛泽东当年的“留人之恩”是分不开的。

那还是1959年夏，年方17岁的李炳淑作为“定向培训生”从安徽蚌埠来到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三年级当插班生，并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好学精神得到了校长俞振飞和言慧珠的赞赏，毕业时校方决定将李炳淑留校任教。此等好事，李炳淑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了。怎奈安徽剧团就是不愿放人。双方争执不下，居然将“官司”打到了毛主席那里。1960年，毛主席在上海参加会议期间亲自将李炳淑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及上海戏剧学校校长俞振飞叫来“断案”。毛主席一见到李炳淑就说：“小李啊，你很了不起啊！你看看为了你的事，上海和安徽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了。好，现在我把你们各方都请来，你们当面谈谈吧。”又对曾希圣说：“李炳淑不是安徽的，也不是上海的，是国家的。她是个人才，我们就要培养喽！上海师资力量强，我看就留在上海吧！希圣同志，你就忍痛割爱吧。”毛主席既有此话，曾希圣还能说些什么呢。有了主席的“一锤定音”，李炳淑的艺术道路也越走越宽。1960年代初，她在《杨门女将》中主演英姿飒爽的穆桂英，一炮打红，轰动了沪港两地。她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此次，主席亲自接见她，她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当她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走进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书房，刚要开口，毛主席便迎上前来，笑着说：“小李啊，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

李炳淑连忙说：“是的，是的，主席这么忙，还关心我，真感谢您啊！可惜您没机会来看我演出。”“看的，我已看了你五次实况演出的电视转播呢！要说感谢，还得我感谢你和你们剧组，为五亿中国农民演了一出好戏啊！”毛主席边说边让李炳淑坐下，还风趣地补充道：“你坐的那个位置就是尼克松坐过的。”随后，两人拉起了家常，李炳淑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看来，你这张饼已经完全成熟了，可以吃了。”李炳淑听了会心地笑了。原来早在1960年代初，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俱乐部举行的晚会上，毛主席偶然听到李炳淑的同学喊她“阿炳”，当即幽默地将“炳”和“饼”两字故意混淆，风趣地对她说：“那你是一张饼喽，你这张饼什么时候能吃啊？”言下之意是什么时候能在艺术上成熟。

◇ 周恩来：“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

周恩来对样板戏的创作也很关心，工作做得细致入微，哪个剧组做出了成绩他就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看出问题他就诚恳地提出意见和建议，遇到困难他就给予帮助。

电影《龙江颂》一收镜，周总理的秘书便打电话给剧组说是总理要看。导演谢铁骊赶紧将片子送了过去。当时总理正好会见完外宾，便来到小礼堂，和大家一起观看，看片过程中总理

还不时地点头。当影片放到“江水英”在大坝上那一段唱词时，周总理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狄福才说：“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周总理听了有些火：“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

狄福才连忙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定下来的。”周总理更加恼怒了：“这不是笑话吗？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嘛，怎么就样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真是滑稽！”

周总理对主创人员、主要演员非常关心和爱护。扮演《红灯记》中反角鸠山的袁世海，“文革”开始后，被一伙人赶出了舞台。或许是他演的鸠山太成功，以致后来顶替他的演员无论怎么努力，舞台上的鸠山总是显得苍白无力。1967年7月31日晚，周总理审看“庆八一”的节目《红灯记》，看到舞台上的鸠山，不满地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旁边有人回答道：“专政了。”总理问：“他有什么问题？”旁边人说：“还没下结论呢！”总理不满地说：“袁世海的情况我知道，幼年进科班，后来在社会上演戏，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让他演吧。”就这样，袁世海从睡梦中被“解放”了，当日就参加了《红灯记》的演出。此后他作为饰演反派人物的待遇是：不挂名，不谢幕。

有一次，周总理在会见出访团成员时，看到李炳淑，便亲切地招呼她说：“哦，炳淑同志也来了。”“你的命运比严凤英好，前些年我太忙，顾不过来，没能保护她，结果她死了，很可惜！你的机遇比她好。你要好好珍惜啊！”周总理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1968年被迫害致死的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也是安徽人。

周总理对样板戏倾注了大量心血。1967年10月我开始担任江青的秘书，到1973年离开她那里，在五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亲眼看到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多少次集体审看样板戏，并与编剧、导演、灯光、音乐指挥人员及主要演员一起座谈讨论，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忙碌的人，像这样的座谈会他几乎每场出席，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他还给予了各个剧组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 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创作人员

为样板戏创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有各个样板戏剧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和全体演员。这是创作工作中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他们是一——

《红灯记》剧组的导演阿甲，编剧翁偶虹。主要演员：饰李玉和的李少春、钱浩梁；饰演李奶奶的高玉倩；饰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曲素英；饰演鸠山的袁世海；饰演王连举的孙洪勋，等等。

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剧组的改编执笔汪曾祺、杨毓珉；音乐设计：李慕良、陆松玲；饰演郭建光的谭元寿；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刘秀荣、洪雪飞；饰演沙奶奶的王梦云、万一英；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饰演程谦的贺永瑛；饰演沙四龙的张郭义；饰演胡传魁的周和桐等演职人员。

《智取威虎山》剧组的编剧章力挥、陶雄、刘梦德、高义龙等；导演：李仲林、关尔佳；饰演杨子荣的童祥苓；饰演少剑波的沈金波；饰演李勇奇的季正其、施正泉；饰演座山雕的贺永华等。

还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组成员，《龙江颂》的剧组成员，《杜鹃山》剧组的创作成员，《奇袭白虎团》的主要演员，等等……

我为什么用如此多的笔墨向广大读者介绍几十位主要演职人员呢？因为江青在“文革”期间到各个剧场观看样板戏的审查演出和出席修改样板戏座谈会的次数太多了，每次都叫我跟她一起参加，说是让我受教育，所以我跟这些演职人员也见了无数次面，对有的演职人员还比较熟悉。我虽然已有三四十年没见到他们了，但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舞台形象至今历历在目。现在我回忆他们，写出他们的名字，是向他们表示怀念之情、敬佩之意。他们是文化艺术界的专业精英。他们在排练时流过汗水，流过泪水，流过血水。他们在演出时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认认真真，精神饱满，激情满怀，魅力十足。

1967年，由当时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于会泳接任《智取威虎山》创作组组长一职。于会泳原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他担任组长后，基本肯定了全剧的音乐设计，并对唱腔曲调作了少许改动，使得一些唱段的句式及词曲关系更趋协调、顺口。又在“胸有朝阳”唱段的尾字拖腔上添了两个音，自然融入《东方红》的音调。于会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造诣很深，对样板戏配音方面的改革创新做出了一定成绩。可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自杀了。如果没有“文革”，如果他没有那份野心，老老实实地做音乐领域的专题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该多好啊！

样板戏自1964年走上舞台接受审查修改，到1974年全部审改完成拍成电影艺术片，前后10年时间，参加排演的演职人员有四五千人，观看的群众有几千万人。我亲自看到的和有据可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或参加座谈会进行审改的就有34人之多。他们是——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李富春、聂荣臻、陈毅、贺龙、叶剑英、乌兰夫、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张治中、李德生、杨成武、吴德、纪登奎、汪东兴、陈伯达、康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

在10年内，有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观看审查几出戏剧，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说样板戏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实不为过。

◇ 《龙江颂》、《杜鹃山》是怎么改出来的

1972年，时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彭富九到朱德家中访问，向总司令请教历史问题时，朱老总说：“我军的历史现在是需要总结出来，教育后代。”他还说：“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我理解朱总司令的意思，就是回忆历史、写历史是一件思想性、真实性、严肃性很强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带有个人的思想感情。史料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详尽，本着这种原则和精神，我谈谈江青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我的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仅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江青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她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多次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当毛主席批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时，江青很快行动起来，多次指责中宣部、文化部：“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

江青思想敏感，思维敏捷。她一旦发现适合演现代戏尤其适合演现代京剧的好题材，就移植到京剧上来，有时也把京剧的题材移植到其他剧种去，还把有的剧目从外地移植到北京来。据我所知经江青移植的剧目就有六出戏：京剧《龙江颂》《杜鹃山》《沙家浜》《海港》《红灯记》，还有交响音乐《沙家浜》。我详细谈谈其中两出戏移植的情况——

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闽南大地遭遇千年大旱，龙海县榜山公社发扬了让水的“舍小家，保大家”的风格。为弘扬这种精神，龙溪地区芗剧团创作了芗剧《碧水赞》，并在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获得好评。1963年12月，福建话剧团又根据龙江抗旱事迹创作并演出了话剧《龙江颂》，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1964年2月5日至3月15日的40天里，《龙江颂》剧组为首都各界演出达32场，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曹禺、田汉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观看，给予了很高评价。

上海新华京剧团也看中了这个戏。在此之前，该团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舞台上已有了工和兵的形象，正好缺少一台关于农民的戏。1964年，新华京剧团在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编创了京剧《龙江颂》，剧情讲的是龙江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为解救上游大片良田旱情，不惜承担重大牺牲，在本队水域内堵江截流，最终战胜旱灾，确保了该县当年的大面积丰收。该剧一经演出，便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京剧团《龙江颂》上演之时，正值江青大搞京剧改革。1966年5月，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该剧后很是欣赏，便对张春桥说：“这个戏，我要了！”“新华京剧团今后不能与这个戏再有任何关系！”深受观众喜爱的新华京剧团《龙江颂》因此被迫停演。《龙江颂》停演后，江青并没有急于上马。直到1969年4月8日，她才指令上海京剧团组建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并投入排练。

由王树元编剧的《杜鹃山》，原是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于1963年上演的一部话剧，剧中表现了湘赣边界一支由队长乌豆率领的农民自发武装，在共产党派去的女代表贺湘的帮助下打败白匪和地主武装，最后奔向井冈山的事迹。江青在上海看了《杜鹃山》后，觉得这出戏很有发展前途，便将它带回北京交给北京京剧团，让剧团改成京剧。北京京剧团立即组成了创演班子。改编后的京剧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很生活化，许多唱段也颇有特色。1964年《杜鹃山》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会。但这次观摩会上，另有宁夏版的《杜鹃山》参加汇演，而且宁夏版的效果更好，以致北京版中的“乌豆”裘盛戎对宁夏版中的“乌豆”鸣盛赞不绝口。江青对北京版有点不满意，公演了几场后就“锁”起来了。1968年，江青主抓样板戏，再次想起了《杜鹃山》，下令修改，由汪曾祺、杨毓珉等编剧，并指定杜近芳替代赵燕侠出任主演，还将剧名改为《杜泉山》。尽管剧组按照江青意思进行了修改、排练，但1970年江青审看《杜泉山》后，仍不满意，尤其对女主角仍用“贺湘”这个名字大为恼火。当时许多人猜测此事可能与贺龙元帅有关，但后经知情者透露，实际是江青的内心一直对贺子珍持有忌讳。

江青对修改后的《杜泉山》不满意，毛主席也有意见，认为《杜鹃山》只反映秋收起义，不全面。江青不甘心，于是指派于会泳负责继续改编，并对剧组说：“《杜鹃山》碰到了一点难题。我们的主席在延安就反对做生日、送礼、命名、立传、拍电影。秋收起义（指《杜鹃山》）这戏，我偶尔讲了一句，主席说不行。不能违背主席的指示，要写不能光写秋收起义，还要写南昌起义、鄂豫皖、湘鄂赣的革命斗争。主席坚决反对搞这个戏，我也很尴尬。这个戏不是我搞的，是上海话剧团先搞的。我付的学费也不少了，你们剧团一年花不了多少钱，电影一年就得几十万……我要到处还账。”于会泳接手《杜泉山》后，立即组织人马对该剧剧情、唱腔、武打等进行了全面改造，贺湘的名字也改成了柯湘，乌豆的名字改为雷刚。同时对剧组人员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更动。对于女主角柯湘，江青亲自出马，点将上海青年京剧团的主演杨春霞。

江青对这出戏非常重视，常到剧组“指导”，于会泳更是亲自督阵。杨春霞回忆说：“一年的排练简直就是没日没夜地在打一场硬仗，有时为了一个唱腔，常常练到后半夜，中间也不休息，搞得演员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样，我们封闭式地排练了一年多，崭新的《杜鹃山》一炮打响！”

江青看了“崭新的《杜鹃山》”很满意，提了点小意见：“柯湘衣服太整齐，要有破碎、血痕，袖子要划破一长条，杜鹃花不红，可以去湖南看看……”“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些，使之有京剧味。京剧还要姓京。京剧要推陈出新，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照顾一下老的人，他们一下子不习惯。”

江青对剧组的班子组成，剧本的改编，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选配，演员的唱腔、动作、服装，音乐的配置等，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去抓，力争做到精益求精，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瑕疵。中央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大师李德伦回忆：“把音乐倒过来也能指挥，乐师们闭着眼睛也不会演奏错误，但是，江青还是要不断地到现场看排练。”与此同时，江青、于会泳还多次请李德伦到钓鱼台切磋音乐设计。中央交响乐团住在东城区的和平里，离钓鱼台较远，当时乐团又没有交通工具，李德伦都是由我去接送。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接送不少于几十次。李德伦高大魁梧，体重足有200多斤。我开的汽车是小吉普，驾驶室的副座位坐不下他，他就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一屁股坐下去，车体就歪过去了。每次上车，我都提醒他：“老李，你慢点，轻点坐，我的汽车受不了。”他开玩笑地说：“没有办法，我喝凉水都长肉。不要紧，我虚坐，不实坐。”

有人统计过，江青参与《红灯记》的修改，由初稿到拍成电影，前后改动达两百余次，大多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剧情与塑造人物形象。江青经常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在舞台上，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要造型。”在为《红灯记》“刑场斗争”一幕设计舞蹈动作时，她亲自爬上舞台，示范步法。

《红灯记》服装的运用，江青告诉剧组，补丁补在肘臂、膝盖和领子的部位，那些部位最容易破损。劳动人民穿着基本都是最便宜的和灰暗的，但戏中的铁梅却穿着耀眼的红色中式上衣，带着好看的发卡，看上去光彩夺目，这是为了突出她的形象。

修改《智取威虎山》时，江青对“打虎上山”一场戏中杨子荣的上马下马费了不少心思。她对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说：“在旧戏中，马是虚拟的。与过去细致的无声表演不同，我要的是栩栩如生的表演，结合现代舞蹈和传统马戏的动作……利用动作和道具跨上一批想象中的骏马，英雄般向前奔驰，同时控制住马的野性。”她还说：“艺术需要夸张，登上想象中的高大骏马时，尽量抬高你的腿，从马身的前部跨上去，这样显示你的骑术高超。下马时，不要跃过马头。下马，要在马背上侧身，抬起一条腿，然后另一条腿，接着跳下来。不直接下马，竖起你的脚趾，用脚趾下马，那样看起来很高贵。”江青在延安就学会了骑马，骑术不错。为了改戏，她在钓鱼台用她的军马练习上下马的动作，以取得现身说法的发言权。

◇ 一些并非无关的细节

1971年11月，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终于进京在首都剧场演出了。25日晚，江青在姚文元陪同下来到剧场审看该剧。这次她看得很认真，拿个小本子，逐场认真地记，每场结束都带头鼓掌，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张春桥对江青看戏也是异乎寻常地重视，专门派人负责观察，记录江青看戏时的表情动作：何时鼓掌、何时流泪、何时在本子上记，包括点了几次头、笑了几次、唱到什么地方打了拍子，甚至打个哈欠都要做记录。江青看完戏后又在休息室接见

了《海港》剧组军代表、编导、音乐、舞美人员及主要演员，说：“我看了《海港》的电视，你们大概也知道了。今天又看了演出，感到戏改得很好，很动人，我感动得流泪了。”她还指出戏中发音问题，说：“你们有一个缺点就是口白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因为原作写的台词没上韵，不上口；另一个是演员演得不清楚。”说到兴奋处，她还亲自给演员作示范，并要求戏中从头到尾都要用《国际歌》贯穿起来，因为这出戏是写国际主义的。江青还教演职人员以服饰衬托或掩饰某些人物的特征。她看到童祥苓个子不算高，但要他演出高大英雄人物的形象，就建议他穿短尺寸的衣服，把佩戴的腰带往上提。这样使他在舞台上腿会显得比较长，人也会显得高大。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江青改“样板戏”大量工作中的一点点。江青身体比较虚弱，每次座谈会，她擦汗用掉十几块毛巾。我们亲眼看到座谈会结束后，她两眼不想睁，两腿不想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无精打采地回到住地。

江青的文艺知识对京剧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戏曲艺术上她虽算不上大家，但也可算得上是中家或小家吧。不少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她在大上海已经是电影明星了。如果她不懂一点艺术，在艺术家云集的大上海能站得住脚吗？江青酷爱京剧艺术，“文革”期间，她每天中午和晚上就餐时，都静听著名京剧老生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和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精彩的录音唱段。她经常听这些精彩唱段，一是喜欢、欣赏，二是为修改样板戏寻得一些启示。有人说，江青不学无术，不懂艺术，瞎指挥，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不够公正。江青对京剧艺术的基本知识还是知道一些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说过：“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是个内行。”在和宝堂撰写的《自成一派·赵燕侠》的文章中讲：“对江青排演的样板戏，赵老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她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懂艺术的’。”

2011年1月7日，我在《作家文摘》上看到黄飞立（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口述、文立青执笔的《被夺走的〈红色娘子军〉指挥权》一文，文中引用吴祖强（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的话：“《红色娘子军》开始不叫样板戏，只是说要创作‘革命芭蕾舞剧’。首演之前，江青看过一次彩排，事先也没有通知，忽然出现了。不过，那个时候跟我们说话还是‘供参考’，很客气，不像后来那么霸道。而且说句公道话，有些地方的确也是起了好作用。比如最初舞剧版本是按照电影改的，里边除了琼花，还有一个丫头的角色，后来舞剧里把这个角色拿掉了，就突出了一个琼花，人物变得清晰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江青的确是一个行家的眼光。抛开政治方面，其实《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白毛女》这几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确可以成为经典。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集体创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真是精雕细琢。”

江青在发现、修改、提高样板戏的整个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但她的自以为是、不可一世也伤害和迫害了一些好人。《红灯记》中，原来李玉和的A角扮演者李少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演技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但江青却觉得李少春“眼里没有她”，说她每次到京剧院李少春“总是不理她”，想让B角钱浩梁换掉李少春，便借口说：“李少春演得李玉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从此，李少春便逐渐远离了自己一手设计塑造出来的“李玉和”。后来，李少春与编导阿甲等人抵制江青的不合理意见，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

《海港》的拍摄，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李文化出任摄影兼摄制组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傅超武任导演，刚从干校出来的谢晋任副导演。他们根据江青“三突出”的指导思想和她提出的“要基调明朗，气势很大”的具体要求，积极认真、小心谨慎地拍摄。《海港》一拍完，李文化便立即送江青审查。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江青还没看完便大为光火，从沙发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把方海珍拍得像鬼，画面又黑又暗，戏给糟蹋了。”傅超武、李文化立即被赶出了摄制组，送进学习班检查反省，原摄制组只留下了谢晋。江青钦点导演谢铁骊、

摄影师钱江接替拍摄。谢铁骊“唱主角”是临危受命，只能加倍小心谨慎，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使方海珍变得漂亮些，他将她的头发修短，并让化妆师将方海珍的眼睛处理得又圆又黑，果然比原来漂亮多了，谢铁骊感到很满意。但为了慎重起见，拍到一半，他便打报告呈中央和文化组，请有关领导审核把关。1973年1月13日，江青让我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17号楼放映厅审看谢铁骊送来的片子，看着看着江青又不高兴了，第二天她叫我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及文艺界代表到钓鱼台开会。在会上，江青对电影《海港》大骂一通：“你们都是专家，我是个二半吊子，什么也不懂，只会找岔子，放炮！”“方海珍站哪儿去了？头发真是岂有此理，眼睛像个棋子……”谢铁骊立即向江青交了一份检讨，大牌谢导受了批评，其他样板戏的电影摄制组也都人心惶惶，坐不住了……

对江青这个人，从正面理解她，她太自信；从反面理解她，她太霸道。凡是她改过的戏，除了毛主席，谁都不能碰。在修改样板戏的过程中，根据江青的指导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三突出”的理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理论对样板戏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但对整个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却起了阻碍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 《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